

AMERICANS & CHINESE
Passage to Differences



美国人与中国人

两种生活方式比较



〔美〕许烺光 著

74258

美国人与中国人

两种生活方式比较



AMERICANS & CHINESE:

Passage to Differences

by

Francis L. K. Hsu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US, 1981.

美国人与中国人：两种生活方式比较

〔美〕许烺光 著

彭甄平 刘文静 等译

*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柳芳南里)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 × 1168毫米 32开本 12.25印张 284千字 插页2

1980年3月北京第1版 1980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13500册

ISBN 7—80033—198—7/Z·018

定价：5.50元

自序

DH87/01

我出生于中国满洲^①南部的一个小村子。我小时候从长辈那里听过俄国与日本士兵在中日、俄日战争中犯下的令人发指的罪行。这两次战争正是在满洲南部进行的。长大后，我在一个小镇里上学，在旅行与工作中目睹了土匪、饥馑、流行病、学生罢课与游行、内战以及西方人的残忍和日本人的侵略。

然而，不管听起来多么难以置信，反正这所有的一切从一开始就没有妨碍我甚至我的许多同代人各自过一种正常的而且往往是充满欢乐的生活。我们在婚礼上欢欣欲狂，看到新娘的嫁妆色彩艳丽，装在两辆车上，在乐队的伴奏下驶过街头。我们还在露天市场专心致志地听人说书和演唱。我们也常沉醉于戏剧或皮影戏中男女主人公的悲欢离合。十几岁上，我们一些同学经常逃学。那时候，我们最快乐的事情便是观看蒸汽机车在地方车站上开进开出。众多的乘客、叫卖的小贩、穿着制服的警察和官员吸引着我们的好奇心。

我们最喜欢的就是中国人的盛大节日——中国的春节，这个节日也属于死去的祖先。届时，我们能吃上美味的鱼肉，穿上新衣服，孩子们甚至还可以玩一些小小的赌博游戏——因为这时我们这些小孩子都有一些从父母、叔婶、姨舅及其他亲属那儿得来的现金。这类似于美国人的圣诞礼物，只是这些钱都是长辈给晚辈的。

^① 原著所说“满洲”，即中国的东北，下同。——译者注

当然，也有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情。疾病流行时我们参加祈祷并在门上贴吉祥物避邪，干旱季节我们舞龙祈雨，土匪抢劫时我们蜷缩在紧闭的大门后面。军阀混战时学校和商店一律关闭，随后胜利的一方到来时学生和老师又一起加入“欢迎”的行列。我们到郊外去看处斩土匪或抨击时弊的记者，正如我们后来成群结队地去看军阀带着卫兵站在敞篷车上耀武扬威地驶过市区一样。我们中有许多人历尽生活的磨难却没有留下严重的创伤。食品匮乏时我们少吃，洪水泛滥时我们逃跑。我们躲避蛮横的士兵，我们逃过贪官污吏，或者为了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利而不得不贿赂他们。我们时常谨小慎微、寡言少语。

后来形势越来越严峻。时局一天比一天糟糕，外部压力越来越大。中苏战争爆发那一年我毕业于哈尔滨的一所高中。两年后，我进入大学，同时日本占领了满洲里。我与父母失去了联系。第二年，日本占领上海部分地区，大学被迫关闭，我在公共租界帮助照顾居住在那里的难民。1933年，我从上海乘船到满洲里，最后一次看望父母。在大连港我被逮捕并遭拷问。两周后，我扮成农民跑到北京，到那里时恰逢日本控制了整个华北。后来的四年内，日本兵、民与其朝鲜被保护人一起施行最蛮横的“自由”。抗议中国政府不抵抗政策的游行学生被中国警察的棍棒、水龙与刺刀所镇压。在中英拳击协会的帮助下，1937年，当日本全面进攻中国的时候，我乘坐一艘英国战舰离开了上海港。

我觉得此后的两年是我有生以来最美好的时光。我在和平宁静、令人愉快的英格兰读书，在英格兰和苏格兰旅游，在法国、比利时、德国和丹麦度假。但是，1939年欧战爆发了，1940年战火蔓延至伦敦，呈现了我曾在遥远的中国见到的毁灭景象。我终日为当晚在何处安身所困扰，因为象昨晚一样，要睡在房檐下或楼道里。1941年，我途经南非、印度、缅甸回到中国。

此后的三年，除了有幸结识我现在的妻子维拉之外，就学术方面来讲，也是颇有收益的。我在云南省境内的一个小村子里工作。我有不少彼此相互勉励和促进的朋友和同事。我完成了两部书稿，这就是后来的《祖荫下》和《宗教、科学与人类危机》。那时，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逃亡、流行病和饥饿是我与千百万中国人的家常便饭。象许多在我之前去美国的人那样，我相信到那里就可以在和平的气氛中工作，我的孩子们也不致再目睹我所见到过的一切可怕的事情。当时正是广岛被原子弹袭击的九个月前。

通过简述我的经历，我希望向读者说明我写此书的主要原因是对于自我保存的个人兴趣。我们正步入全球战争的边缘，而且，即使是“局部”的战争，也可能埋下整个人类毁灭的种子。此外，正如60年代末我们遇到国内威胁时，国家防务委员会（领导人是弥尔顿·S·艾森豪威尔博士）所说的那样，这种威胁只不过与“任何外来威胁的可能的组合”相同罢了。要是期望我们的处境有所改善的话，每一位思考着的人都应毫不迟疑地去努力寻找那些把我们置于如此境况的基本原因。

我是一个“边缘人”。我出生并成长于一种文化环境中——在那里，生活停滞，大部分人的生活几乎完全可以预知，后来我被从这一文化中赶了出来，到另一种文化中生活和工作。在后一种文化中，人们渴望变化，因为它本来就追求进步，万物与众生的面貌总是变动不居的。处在对比如此明显的两种文化环境的人，本来就徘徊于每种文化的边缘。他自己就象是漫步于这两种文化边缘上的两个人一样，时常接触，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这本书报告了一个“边缘人”的生活经历以及对此的思索。

当然，我也是一个讲求科学的人。在收集、阐述和解释有关事实材料方面，我尽力做到客观公正。因而，这本书所记述的既

非中国人心目中的美国，也不是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我真诚地希望在本书中坦率而公正地分析美中两国人民的生活方式。我尽量将生活经历和系统的研究成果这两方面广泛的资料联系起来；这种研究方法无论就个体来说还是就社会来说都是颇有意义的。

为了完成这样的任务，我以重视人类行为的原则为指导。人类行为的原则还需要人们甚至包括许多社会科学家进一步加以理解。我确信，每一位涉足另一种社会和文化的学者以及那些想把自己对该社会和文化的理解告诉别人的学者都必须自觉地使自己成为某种意义上的“边缘人”：也就是说，他决不能将这种社会与文化中的习俗、制度、工艺象土生土长的人一样看作是自己的东西，不仅如此，他还必须象那些土生土长的人一样努力去感觉这些东西。否则，他就难免掺杂自己的种族偏见，也难免对事情的重要与否加以猜测。这是一项十分困难的工作，尤其是对那些总以为自己文明当然优越的人来说更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美国黑人声称黑人研究不能由白人来进行，甚至于也不能由混血儿来很好地完成的原因。

如果一位学者不自觉地培养（为了起一个更好的名字，我们称之为）“边缘人的资格”，他就不可能感受他的研究对象。因为即使他的优越意识在此并无妨碍，也可能由于其内在的文化假设而使他在选择看什么与如何理解看到的内容方面存有偏见并有所歪曲。正因为如此，许多局外人以为印度人的祭牛纯系浪费而没有想想他们自己的基督教堂里大量经济类祭品意味着什么。而许多西方人热衷于寻找中国的宗教迫害是由于西方历史上和现实生活里的宗教冲突以及与教会相关的冲突。

没有获得“边缘人资格”的简单公式。但是比较的方法仍不失为一个良好的开端。也就是说，学者必须在寻求理解别的生活

方式的同时，仔细地考察自己的生活方式。这项工作可以在最基本的层次上展开，例如，不仅要考察中国对美国的行为及美国对中国的行为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而且还要确定，假若美国人穿上中国鞋，美国人会怎么走路。

在更为深刻的层次上，将自己与他人的文化作系统的比较为学者们提供了正确的视角。这可以减少学者们判断自己社会的行为时实事求是而判断其他社会的行为时却主观臆测的倾向。例如，我们急切地想知道为什么会有门菜大屠杀（诸如战场上的歇斯底里）或者为什么它本来又不曾发生（因为我们的政策在最高层次上从来就不导致任何罪恶）。但是，我们同样渴望寻求过别人犯下的真实或被宣称的罪恶的相似原因吗？

这也可以帮助学者更好地区分文化的特异性与文化的普遍性。例如，几乎所有的西方记者都目睹了法国和越南的会谈中关于谈判桌形状的争执，并将其视为活生生的“东方式”面子的实例。如果他们稍微从历史角度做一下比较，他们就会知道这与“东方式”毫无关系。大同盟战争结束后1697年的里斯维克和约用了六个月的时间才最后签署，因为双方（法国与神圣罗马帝国）代表为谁先步入会议大厅而争执不下。最后他们决定一起步入大厅才算解决了问题。类似的争议在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和1945年的波茨坦会议上都出现过。1815年五霸通过五个门同时进入会场，而1945年邱吉尔、斯大林和杜鲁门也同样从三个门重演旧戏。

不过，即使对那些移民来说，尽管他是一位出类拔萃的“边缘人”，他的“边缘人资格”也会随境遇的变化而转瞬即逝。

我希望读者允许我再一次联系一些我个人的经历。50年代中期以来，自朝鲜战火停息和麦卡锡反共歇斯底里结束后，我稍微有些轻松了。许多新鲜事物涌现出来。新的大众传播媒介——电

视问世。它占去了我许多时间。靠着孩子们的帮助我甚至欣赏起弥尔顿·伯利与豪狄·杜蒂的节目。^①第一次太空探险使我回忆起在满洲里上学时关于我父亲的一些有趣的往事。我的父亲直到1943年去世都一直相信世界是圆的而且是静止的，它的形状象一条鱼。据他说，这就是为什么哥伦布可以向西航行发现美洲。他的观点当然与我在学校里学到的道理不一致，于是我便与他争执起来。我们常常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因为我不能完全说服他。但是他决不训斥我，他为了我的前途服从了我的新式学校。然而，私下里我总是希望找到非常有说服力的证据来一劳永逸地解决我们的争论。要是我能给父亲看看宇航员从月亮上拍下的照片那该多好啊。

除了这些令人难忘的事情之外，我基本上是在令人满意的环境中生活的。在学问方面，我不断进步，我将我最得意的思想不断整理成书出版。我向尊敬而专心的观众发表演说。我带着妻子和孩子去欧洲、印度、香港和日本；又返回美国。在远离美国的时候，当我感到作为一个美国旅行者我具有一些美国人的毛病时，我对自己十分厌恶。在返回美国时我十分惊异于自己已是如此习惯于美国的一切，包括她的人民及其生活方式。

毫无疑问，原子弹的阴影是无所不在的。——因为我们美国人以及俄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总是到处做试验。但是即使一触即发的古巴导弹危机也未长时期地干扰我。

我的“边缘人资格”在逐渐消失，这使我既感意外又觉悲哀。南越总统吴庭艳及其得力助手在1963年9月被谋杀。他们的同伙或逃亡或被杀，到处是淋漓的鲜血。许多无辜者横遭杀戮。

^① 弥尔顿·伯利(Milton Berle, 1908~)和豪狄·杜蒂(Howdy Doody)是美国早期电视明星。——译者注

此后不久我正从西北大学到旧金山参加美国人类学协会年会并宣读论文。在飞机上，我深为越南人民的灾难感到悲哀，却也暗自庆幸这种情况在美国不可能发生。正如中国一句旧格言所说的那样，我是“隔岸观火”。而我的愚妄在开会的第二天即因肯尼迪总统遇刺而烟消云散。当我在电视上看到凶手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在执法官员的重围下露面时，我的心情无可名状。

象千百万其他人一样，作为一名普通的而又自鸣得意的美国中产阶级中的一员，我将个人的人身、家庭、收入、工作的安全保证看作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就象每天的日出日落一样。一个人也许不再注意太阳的运行，而陶醉于一次美丽的黎明或迷人的黄昏。但人们决不会怀疑在任何一天太阳都会升起又落下。事实上，我的工作是如此繁忙以致于我竟会忘记我这本书中的部分含意。

在达拉斯事件之后，我被迫停下其它工作，重新思考我们整个国家的困境——这种自1963年以来便每时每刻都在扩大并日趋紧张的困境。可恶的越南战争已经过去，但是为这场战争的巨大失败付出的心理代价，将长久地打击着我们。这正如最近的伊朗混战一样，更不用说美国威信的下降与美元的贬值了。在国内，肯尼迪遇刺之后，接着便是罗伯特·肯尼迪和马丁·路德·金以及其他许多不太著名的人物如旧金山市长乔治·莫斯科尼的遇刺。为了避免受到起诉，一位总统和副总统被迫辞职。学生已不象60年代那样安分守己，但是吸毒、种族歧视、破坏行为、人与人之间的暴力和令人困恼的公共教育制度都是我们时代明显的特征。

有趣的是，研究美国社会问题的人常常斤斤计较于表面现象。例如，为了对付破坏行为和暴力，他们求助于保镖和先进的监督设备，为了消除种族歧视与少年犯罪，他们依赖于就业机会

欢迎访问：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https://www.shgis.com>)

文档名称：《美国人与中国人：两种生活方式比较》(美)许烺光.pdf

请登录 <https://shgis.com/post/11881.html> 下载完整文档。

手机端请扫码查看：

